

106 年青年好政論壇

討論議題 4：如何促進學生參與公共事務？

如何培養學生公共參與？

撰稿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 林佳範

一、前言：「為何要參與？」

在聯合新聞網 2013/08/29 的民意論壇，看到這樣的標題：「年輕人：我們沒那麼想改變世界…」，署名的是一位高中生，他說：「我曾經問一個好朋友：

『我們一起改變世界好不好？』她說：『不要，太難了，沒有投資報酬率。』我相信多數年輕人都是這樣想的，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做不到』。」有這樣的投書，也不難想見為何現在大學的學生自治，最大的問題在於沒人要參與，全國大學的學生會會長平均投票率，往往低於 25%，更常有推不出候選人的困境。

在我們的社會，高中生會有這樣想法，一點都不意外，其不僅不想改變世界，認為自己「做不到」，且認為對自己而言沒有任何的「投資報酬率」。試想從小師長都告訴你，學生的職責就是「念書」，且不是念任何的「書」，只能是與「考試有關的書」，其他的事都不要管，換言之，其他的事就交給父母或師長，你不可能期待他有能力參與公共事務或有獨立自主的能力；更糟的是，這種培養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已被追求自己的「功名」(好成績)正當化。雖然我們也有「公民教育」¹不是嗎？先不論這門課，常被借來考試，更糟的是，學生就算是有上，也往往是用來應付考試！我們不要自欺欺人，在這樣的教育下，我們培養的學生是自私自利的，且會依附在威權下，因為其從小就被削權(disempower)，更不要期待其成為民主社會中能參與公共事務的獨立自主公民。

在我們的社會，不鼓勵學生參與公共事務，還有另一個考量，即認為太「政

¹ 我國參與 2009 年國際公民素養調查，在認知測驗 38 國中名列第 4 名，但在參與活動的調查，卻最後一名，請參閱 Wolfram Schulz, John Ainley, Juilian Fraillon, David Kerr, Bruno Losito, ICCS 2009 International Report: Civic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engagement among lower-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38 countries,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IEA.

治」。這顯然是白色恐怖的遺緒，在威權統治的時代，太關心公共事務是會被「關心」的，人民不被期待來關心公共事務，甚者，若太積極關心公共事務，往往即被當權者所掌控，且往往沒有好下場，因此父母親並不鼓勵孩子去關心公共事務，甚至被認為「吃飽太閒」！「政治」不是眾人之事嗎？但在威權統治下，這是統治者的事，一般人僅被期待當「順民」，並非是民主社會的「公民」。因此，「政治」即被賦予「負面」意涵，而不被鼓勵。然而，你不管政治，政治就不會影響你嗎？特別是在民主的社會，雖然沒有了威權的統治者，但為追求在社會上平等的自由，你的小孩可以沒有能力參與公共事務嗎？先不論追求公共的善，公共事務往往涉及資源的分配或公共規範的制定，都與你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你可能置身事外嗎？

其實，為何要培養公共參與的素養？其並非僅是與民主的運作有關，如 Dewey 在上世紀初即提醒我們，其更與知識的學習(教育)本身有關。甚者，何時該開始培養？或如何培養？這些問題，我們一一來探討！

二、從「小」培養起？

小朋友很小，會知道什麼叫做「公共參與」嗎？他們或許不知道這四個「字」的意涵，但他們也是會有集體或公共的生活，不是嗎？家庭生活或許是最早的基本集體的公共生活，可是畢竟家庭有特定的血緣或親密關係，和與其他沒有特定血緣關係的公共生活，畢竟不同，因此才會送小孩到學校進行「社會化」，即學習公共生活所必須知道社會規範。有需要面對公共的生活，自然就有機會進行公共參與，不是嗎？

日前有則高雄中學的學生²，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的選舉公告中，以仿冒納粹的口吻，來寫自己的政見，在之前新竹光復高中在校慶中展演納粹而引起廣泛的批評與抗議後，自然招致廣泛的議論，然而，更令人難過的是，在同一選舉公告的政見，竟然都是在 Kuso 或搞笑，沒有一則是認真的或正常的，顯然校園的學生代表選舉，對學生而言或許是他們考試壓力之餘，尋找娛樂的另一個出口。我們的校園自治，若淪為「笑話」，對於台灣的民主前途，可就「不好

² 請參考蘋果即時 2017/04/11「雄中生惡搞 學聯會選舉政見倡納粹帝國」(周昭平／高雄報導 23:33)。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411/1095571/>

笑」！

其實，高雄中學的學生，他們會在政見中模仿納粹，其實是在諷刺學校減少學生代表的人數，而學生的搞笑或 Kuso，或許也可看成學生對於校園學生自治的一種抗議。換言之，學校對於學生的自治，並不鼓勵或真正的授權或給學生自主的空間，僅是維持一個形式，那將這個「形式」弄的可笑，或許是在表達：大人們不看重學生自治，那我們為何要重視它，那就讓它成為「笑話」。我們的校園，從國小、國中、到高中，不僅「學生自治」，很多僅成「形式」的活動，如舉辦小市長的投票或選出參與校務會議的學生代表，但多未給予實質的自主空間，以去年的高中生有關服儀規定之爭議為例，學生往往因為無法透過校內的參與管道，來改變學校的規定，只好透過外部抗爭的方式。

雖然台灣社會的民主化，一路從 1987 法律體制的「解嚴」與 1994 教育體制的「教改鬆綁」，惟校園的抗爭仍不斷，如 2006 的髮禁解除和 2016 的服儀免罰。在校園中我們對學生的管理，很多學校似仍停留在「管制」的心態；即學生的自由或自主是例外，而凡事皆需經過同意，例如襪子或鞋子顏色。然而，出了校園特別是進入網路，反而是無限寬廣與自由的領域，落差甚大。這樣的校園管制模式，或許是出於保護未成年的學生為理由，但這樣的模式，對培養民主的獨立與自主的公民是不利的。甚者，從規範價值教育的角度，也無法培養出學生對社會公共參與的責任感或內化重要的價值，如尊重差異或包容多元價值。

如前揭小孩很小為社會化即有公共生活的必要，以幼稚園的學生為例，我們可以從小即培養其公共參與的能力，如果我們可以給予其自由與獨立自主的空間，特別是有關公共規範的形成。以「搶玩具」為例，若發生時您會如何處理？只找會搶他人玩具的學生嗎？視其為個人的行為偏差問題嗎？處罰會搶玩具的同學？然而，這樣的模式，並未正視公共資源的使用與分配的問題，而且忽略公共規範形成的重要性，錯失民主法治教育的機會，甚者，教師僅以其作為大人的「威權」來壓制學生，更是一種反民主法治教育，不僅是其害怕威權、依附威權、未來也可能變成威權。

從學習公共參與或民主法治教育的角度，教師可以讓小朋友一起來面對「搶玩具」的問題，因為玩具的使用和每位小朋友皆有關係：「小朋友!」、「剛

才有兩位小朋友在搶玩具，結果大家都很不高興，你也想玩!他也不想玩!大家都很想玩玩具!但我們的玩具只有這幾件，那怎麼辦？」這樣的提問，是引導小朋友，學習在公共生活中，解決資源的分配與使用的紛爭，需要透過「規範」來形成秩序。我們大人常會因為是那「資源的分配者」或「規範的制定者」，而忽略其實讓學生認識「規範」的重要性，蓋我們僅是想讓小朋友「服從」我們即好，而忽略了「規範」的存在，並非是讓小朋友「害怕」或「討好大人」，更重要的是為了「公共生活的公平秩序」。

甚者，也是因為認為小孩的依賴與附屬，我們反而忽略，引導小朋友的參與規範的形成，係培養其責任感與規範價值，所不可或缺者。將問題給小朋友，他們才可能學習與成長，他們可能會回應他的經驗，如「我在家都可以拿玩具就玩！」，老師引導小朋友反思自己的認知限制，才是其改變認知的開始，而不是因為其不成熟反不給其參與和學習的空間。透過小孩的回應，我們才知道其認知的盲點，如他可能還不是很清楚「家」和「學校」的場所不同，而幫助其區別二者的不同，甚至，導引其認識「所有權」的觀念，如「家裡的東西，家裡面的人可使用，但學校裡的東西，學校裡的小朋友，大家可以使用!」、「可是!要大家都可以使用，又不會有爭吵或搶玩具的情況，那要怎麼辦?」

從必須面臨公共生活的情況，即可使小朋友參與公共規範的制定，不要因為他們很小，即事先排除其學習的機會，甚至均由大人幫其決定或制定規則。從民主法治教育的角度，大人幫小孩建立規則，雖然很快也很方便，惟會有三種問題：第一、學生所學到的規則，是「威權式統治者的命令」而非「民主式共同生活規則」；第二、規則的建立，並非訴諸規則的公平性、明確性、可行性，而係大人的威權，剝奪其思辨公共生活建立公共規則的必要原則；第三、學生的公共責任感，因為沒有參與而無從建立。小孩會依賴與附屬，但我們若要學生獨立與自主，大人要學會「放手」，但不是完全不管，在尊重其主體性的前提下，引導與輔導其參與公共的生活，就從規範的治理，開始做起。

三、從「班級公共事務」培養起？

每個人在生活中，其實會面對不同層級的公共社群，如班級、學校、社

區、縣市、全國、全球等，特別是網際網路所推波的全球化浪潮，日漸在不同層級的社群，皆有不同可能或不同程度的參與。然而，從民主法治教育的學習而言，學生因為離開家裡到學校，即進到班級教室，其校園共同生活，當然不限於其班級同學或老師，但不可否認的，班級社群卻是其學習與生活最密切者，就公共生活而言最直接者，因此，校園的公共參與學習，就從班級的事務開始做起。

班級有哪些公共事務？有關班級的資源(包括利益與責任)分配者，如教室座位的安排、各種學習的資源或機會、各種班級幹部的職權(責)、學校的差事；有關班級的公共秩序者，如安寧、整潔等等。其實這些事務的經營，無不影響著學生的學習與成長，在我國的校園裡，一般係給導師班級經營的職權與職責。很多班導師非常辛苦，一班有二三十個學生要能擺平，凡事自己親力親為，除了自己分配各種事物，更要解決學生的各種需求或紛爭，也需要以威權來建立秩序，基本上他或她講的各種「要求」就是「班規」。然而，往往老師累得半死而學生則「講都講不聽！」，且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則變得對立和緊張。

這樣的班級經營，顯然有問題，因為除了老師疲於奔命以外，更重要的學生並沒有學到民主與法治的素養；班級的公共生活，顯然老師沒有讓學生參與，沒有讓學生開始承擔公共生活的共同責任。以教室座位安排為例，若由老師來安排，雖然老師可以自由調度，惟時常會有同學或家長要求更換座位，老師必須時常處理不同的需求；最可惜的是，學生喪失機會來學習建立公共的規則，解決公共秩序的問題，換言之，面對資源分配的公平合理性問題，若大家要有平等的自由，我們不能僅從自己的角度或需求來思考，必須從公平或公共的角度來思考；唯有面對真實的不同需求，學生必須跳脫自我的角度，開始從他人或能兼顧到所有人(普遍性)的角度，即建立所謂「公共性」的角度。

班級的集體公共生活，一定會有其涉及所有人的公共性面向，惟班級導師若沒有讓學生參與公共規則的治理，嚴格講學生並未真正理解或面對所謂「公共性」³，蓋老師將所有的學生簡化為一個「整體」，而不是真正的面對每位學

³ 德國哲學家 Jurgen Habermas, 在其早期的著作.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 即以歐洲在早期民主化過程中所出現，相對於公共權威的「獨立自主」公共領域，來研究其轉變。以「獨立自主」為要件，校園在上對下的教育關係下，並無法出現民主化下所謂「公共性」。

生的主體性，即每個人有其不同的需求，但卻又必須共同生活在一起。換言之，所謂「公共性」並非建立在所謂「集體性」，而係每位獨立自主的主體，面對大家都會一起受影響的「公共性」。威權統治下一樣會以「人民」為名來號召，惟一切仍由統治者來代其發言，而民主治理與其最大不同，即在於人民自己可以基於「公民」的身分來發聲。在民主的社群，每個人基於平等的地位，有同等的發聲權，共同來面對社群的資源分配或公共秩序的問題，一起建立公共的規則，如此的規則就不是反映老師的個人意見與意志，而是社群集體的公共意見與意志。

學生的公共參與，可從班級事務開始，且取決於班級的導師，是否願意允許同學共同來參與班級的規範治理，包括資源分配與秩序的維持，而非僅是無關規範治理的「班遊」等一次性活動的規劃，蓋如此的規範治理面向的參與，才會涉及日常實質利益與價值思辨的可能性，才能學習到實際的公共規則建立，而非僅是一次性的活動規劃，才是實質的民主法治素養的日常培育。

四、從「知識與價值的公共審議」培養起？

除從班級公共事務的參與外，學生的公共參與，更可以從課程上的知識學習，進行知識的公共審議。因為升學主義的關係，我們的現場教學，往往被扭曲為「填鴨式教學」，即將教學簡化為講授考試的重點，而學生亦將學習窄化為記憶背誦要考的資訊。在此模式下，知識學習是單向的且傾向個人的，無所謂「公共性」或「公共參與」的可能。然而這樣的模式所培養的學生，有可能符合時代的需求嗎？符合教育的理念嗎？

在網路與數位化的資訊時代，知訊或知識的變更快速、知訊或知識的取得便捷、多元的價值與觀點雜呈，在教學現場仍固守所謂「標準答案」或單一價值觀點的

教師知識權威，勢必逐漸式微或不合時宜。特別是就算教室禁止使用手機或連接網路，當這些智慧型裝置或網路，是如此的普遍與可及時，學生脫離教室或校園，馬上就連接與進入到另一個網路世界，是如此的開放與多元，可能馬上挑戰學校、教師、或教科書的說法，換言之，教室內的學習，不可能自外於網路的影響，甚者，網路所提供的知識或資訊的內容，更倍增與多元於教室或學

校所能提供者，教師的教學或教科書的內容，很難不被比較或從不同的觀點所檢視。

當學生從小即接觸網路，在網路的平台上他可以自由與自主的發言，同時也必須接觸各種不同的回應；相對於網路上的自由與開放，而一進入校園或教室，則必須被動的乖乖接受所謂「教學」，如此模式很快就會被挑戰，學生不是覺得無趣趴在桌上睡覺，不然就是直接挑戰教師或教科書的觀點。其實，早在上一世紀初期，Dewey⁴受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知識或真理主張往往僅是實用上預設，其必須接受檢視，而在其有名的〈民主與教育〉，即預見「教育就是民主」，民主不只是政治的體制，更是日常的交流與互動模式，而轉化為教育的模式，知識的學習也必須是民主的互動與交流，且在相互不同觀點的相互刺激下，才可能加速知識的創新與增展⁵。

其實，網路所提供的公共平台模式，反而是我們學校教師所應學習的對象；在教室中的學習，老師不應是答案的提供者，而是針對學習的問題，引導學生一起來找答案；在平台上每個人均可提供不同的意見與看法，可是必須接受公共的檢視，不是老師提供所謂「標準答案」，而是大家一起審議，找出最「合理的答案」。相對於被動地聆聽與記誦答案，在主動地參與公共的知識審議過程，比較可能發展分析、批判、創新等高層次的認知能力，而非記憶、背誦等低層次的認知技能。因此，十二年國教的課程與教學改革，即提出自發、互動、共好的終身學者的學習素養的方向，學習重點不應只是學科知識，也應包括學習的素養，而在教室建立學習社群，教師引導學生一起進行知識的公共審議，即是培養學生學習素養的適合模式。

面對知識的公共性，平時在學科知識的學習課程中，進行知識的公共審議，也是一種公共參與。此外，在民主社會中「價值」的學習，也需經過公共審議的過程，不僅達到價值的「認知」，才更可能達到價值的「認同」與生活「實踐」。在民主的社會，因為保障人權，在合法與不侵犯他人的權利下，尊重

⁴ John Dewey (1859-1952)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916 New York: Macmillan.

⁵ Dewey 雖沒用「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詞，但其已點出民主絕不僅是政治的投票體制，更有社會互動交流的面向，與後來 Habermas 等所主張「審議民主」，強調透過公共審議來形成公共意見與意志(政治的正當性基礎)，指出相同的進一步民主化的方向。

每個人追求各自不同的價值自我實現，而勢必是多元價值的社會，不管是宗教上、表現上、甚至性別上多元化，是受憲法所保障，惟此非謂沒有公共或共通的價值，不需藉由學校教育來培養，如尊重差異、包容、人性尊嚴、平等、法治等。

在民主價值多元的社會，這些公共的價值更需透過社群公共參與和審議的方式進行，蓋很難再透過前揭所謂「標準答案」或單一價值觀點的填鴨講授方式，而淪為所謂「價值灌輸」或「政令宣導」。這樣的模式，不僅無效，甚至違背前揭的公共價值如多元與包容等。教師在進行價值教育，除轉化為引導者而非答案的提供者外，更不能迴避價值或利益衝突的問題，蓋根據美國的心理學者 Kohlberg⁶的理論，正是兩難衝突問題的思辨，是促進學生道德發展的重要因素，甚者，若能結合具體的社群，才能有實際的道德動機或具體實踐的可能性，而此正好呼應前揭應從學生的「班級事務」開始公共的參與。

換言之，不僅知識認知的學習，甚至連價值教育的學習，都是學生學習公共參與的契機，在公共審議的過程中，針對具體狀況下價值的衝突，進行價值的公共思辨與評估，才可能對價值不僅認知，且能達到認同或甚至實踐。以同性婚姻為例，在社會上有不同的立場，針對不同立場的理由，老師可以帶領同學一起進行價值的公共審議，共同檢視其是否合理，重點不在於要同學採取特定的立場，更在於理解不同的立場，並思辨價值衝突下，在具體的脈絡下有沒有可能調和與調整，甚至在追求共好下相互包容不同的立場，即在實踐民主社會的包容價值。

五、從「公民行動方案」培養起？

學生的公共參與能力培養，除前面提到「從小」、「從班級事務」、「從知識與價值的公共審議」開始學習公共的參與外，更可從「社會參與式課程」的角度，讓學生來完成所謂「公民行動方案」⁷。以系統化的分析具體的公共議題，

⁶ Lawrence Kohlberg (1927-1987)就道德教育主張「道德兩難」(moral dilemma)而晚期轉向「正義社群」(Just Community)，因為其自殺晚期有關道德教育即由其門生共同發表 Power, F.C., Higgins, A., and Kohlberg, L, Lawrence Kohlberg's Approach to Moral Education,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⁷ 「公民行動方案」(Project Citizen)係美國公民教育中心(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為慶祝美國建國兩百周年，受美國政府所委託發展的教材之一，在台灣已由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取得

理解其成因並掌握當前政策的問題，並研擬各種具體可行的解決政策，並分析各種政策其各自的利與弊，甚至應選出全班認為最好的政策，且分析此政策之合法與合憲性，並具體規劃行動策略，付諸實行。作為課程，其最後要求同學能以「四面展示板」與所蒐集資料的「檔案夾」，類似科學展覽的模式，公開發表與展示並接受公共的評議；企圖達到培養學生關心公共事務、對公共政策的批判與分析能力、改變公共政策的行動力、團隊合作的能力、公共審議的能力、公開發表的能力等。

一般而言，可以由老師帶領一個班級，一個學期完成一個公民行動方案。然而，老師也可以視情況，調整其實施模式，最重要的是要能掌握本課程的重要精神與理念，本課程基本上可依其要完成的展示板的工作，區分為四個階段，與最後的公開展示與反思，簡述其工作要點如下：

第一階段：確認所要討論的公共議題

此階段在培養學生對於公共議題的關心與認識。鼓勵由學生自己發想與提出，有時為了避免漫無邊際或因應其學習年段，如果是國小低年級，可以其班級為範圍，而中高年級則可以擴及校園或附近的社區，而國中或高中甚至可以全國性或全球性的公共議題。有時亦可配合課程的學習，如可引導應用其所學的概念，如人權或環境保護等議題。其實學生一開始，比較不清楚何謂「公共政策」？也不清楚誰在負責此公共政策的推行？然而，不要因為其年紀小而否定其學習機會，本課程即建立在 Dewey 所強調「做中學」的模式，讓學生實際去面對問題與自己去探索，才可能培養其學習素養。此階段老師引導學生的重點：能清楚地敘述問題與說明原因，並能證明問題的確存在；能明白解說問題的重點爭議；說明社區中對此問題有無不同的意見；能說明為何次問題需要政府(學校)出面解決；展示板和檔案夾中能提供互相支持的論證資料。

第二階段：檢視各項可行的公共政策

此階段在培養學生的政策分析與批判的能力。為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學

生可以蒐集社會上對此議題發表意見的個人或團體的意見，若發現資料不足，可以電話或親自訪談或網路搜尋已發表的看法，但同學自己需進行歸納與彙整，最後整理出幾個不同的政策方向，並要能評估與分析每個政策的利與弊。在此階段，老師引導學生的重點：能針對問題提出兩、三個可行的公共政策；能寫出每個公共政策的利弊；能寫出個政策的爭議與衝突；展示板和檔案夾中能提供互相支持的論證資料。

第三階段：提出自己的公共政策及其理由

此階段在培養學生的公共政策的決定能力。經過前階段進行公共政策的分析，學生要學習如何進行決定，除前面的政策的利弊外，其若選擇某個政策，其更必須能掌握負責此政策的政府單位或涉及的相關法令、說明如此的政策是合憲的、能掌握說服他人的重要理由，在此階段，老師引導學生的重點：能描述所處理的公共政策並找出其相關的法令並找出其所負責政府單位；說明此公共政策的利弊；說明支持此公共政策的理由和證據；說明其不違背憲法；展示板和檔案夾中能提供互相支持的論證資料。

第四階段：擬定具體可行的行動方案

此階段在培養學生推動公共政策的行動力。既然已決定其要推動的公共政策，其必須更進一步去擬定具體與可行的行動計劃。換言之，必須考慮到如何進行遊說或進行公共的倡議，例如、如何尋求支持者、如何遊說反對者而能接合成更大的力量，如何去影響決策者等。在此階段，老師引導學生的重點：能列出需要被說服的個人或團體(包括持者與反對者)；能列出需要被說服的政府官員；寫出如何讓公共政策通過立法的行動計劃；展示板明白顯示擬定行動計畫的基礎；展示板和檔案夾中能提供互相支持的論證資料。

最後階段：公開展示與反思

在最後的階段，透過公開展示，除培養學生的公開發表與即席的應對能力外，更凸顯公共參與的公開與公共性。公開展示，除將自己的四個展示板和檔案夾展示外，更要學生接受專家(可邀請)或其他社群成員的提問而回應。公共

政策，本來就是每個人皆可關心與參與者，若邀請校外的相關領域人員，來和學生互動本身即可拓展學生的視野；透過他人的質問與回應，學生可以延伸公共審議經驗到班級外，有助其公共參與的經驗。反思，其實是實作課程模式，所不可或缺者，因問在實作的過程中，會讓學生經歷許多的現實經驗，本來就是課堂上所無法體會者，而透過反思的過程，老師引導學生反省過程中經驗，才能讓這些經驗可以和其所學過的知識相關連結或更延伸其過去的所學，而使其所學更具意義性。

六、從「參與校務與學生自治」培養起？

誠如前面所揭，最好的公共參與培養，應該從小且從班級開始，且不僅是在班級經營且課程與學習上，皆有公共性的面向，皆能引導學生參與公共的審議，而促進其學習與發展。然而，全校性與學生有關之事務，或所謂「學生自治團體」，亦是培養學生公共參與的重要管道，且這兩者皆在高中與大學階段，甚至有法律明文之規範，且視為「增進教育效果」⁸所必要。大學階段的學生自治，甚至在大法官釋字第 380 號的理由書，認為係延伸保障表現自由之大學自治的一部分。換言之，學生的參與校務或學生自治，係被肯定為法律或憲法所保障之權利，且係重要的教育措施⁹。

不管大學或高中，學生在此社區或社群中學習，不管是生活上或學習上，皆有許多與其相關之事務。有趣的是，在校園中這些「事務」，本來都是在校師長的「職務」，如前面提到的班級經營面向，本來是導師的職責，而在校務經營上，相同地本質上也是學校的校長與行政等之工作，並非學生所應承擔者，而也因為這樣，這些「大人們」往往對於學生參與的程度，很難拿捏甚至有不敢放手的情況，往往也是因為如此，而和學生造成緊張的關係。以宿舍之門禁為例，學生為了自由的進出主張開放，而校方為了安全主張管制；如此的門禁爭議，即凸顯校方的安全維護職責，往往並不視其為學生可以參與的「公共」事務。此即凸顯，學生參與校務或學生自治，首先必須面對者，乃學校的開放學

⁸ 大學法第 33 條第一項與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3 條，皆提到「增進教育效果」。

⁹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其所推動保障兒童的教育權，提到三個面向：受教權、學習權、學習過程的主體性，而在「學習過程的主體性」，即提到「尊重學生的參與權」。請參考 UNICEF, A human rights based approach to Education for All, p28, 2007.

生參與的程度，和學校或老師所應扮演的角色與職責。

然而，讓學生參與並非要使其承擔師長的責任，目的應該是使其學習與成長，如法規所說「增進教育效果」。要慢慢讓她或他，能站在大人權責的角度來思考，學生才會學習承擔責任，不是嗎？以宿舍門禁為例，學生被管當然很不自由，且往往思慮不周全，惟若僅是由校方來決定，和開放讓學生參與審議，此二者在促進學生的學習與成長上，有很不同的效果。邀請學生來參與決定，一起審議各種情況的可能性，評估各種措施的利弊得失，學生才可能提升其視野與各種能力，當然師長的經驗比較豐富，可以提出更周延的問題與看法，可是也不要小看學生，他們也有可能提出師長們所忽略掉的角度。此外，邀請學生共同來參與，亦可提升學生對於社群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實質地老師和學生基於平等的共同參與關係，才比較可能達到教學相長的教育目標。比較令人憂心的是，做半套的學生參與校務，即形式上有學生的代表參與討論，然而實質上學生的意見被忽視或未回應，最後更以師長的權威或人數的優勢，強行決定。如此不僅未能使學生學習或成長，甚至導致學生的削權、降低政治效能感或犬儒化，更不用說不會增加社群的認同感，反而是對立與不滿。如此即違背法律規範的目的，反而降低「教育的效果」。如此的參與，並非真正的公共參與，自然無法培養學生的能力或素養。

七、 結語：給學生「自由」，才會培養其「責任感」！

我們大人常期待學生要有責任感或小孩要長大，可是我們卻又不願意放手，凡事仍需大人同意，如此根本無從培養其責任感或自主性，只會依附在大人的身邊。

要培養學生公共參與也是一樣，若從小即不讓其參與的空間，甚至不鼓勵其關心或參與公共事務，如前言中所列舉的高中生實例，其不僅覺得無從改變社會，甚至淪為自私自利的「私民」，只會斤斤計較所謂「投資報酬率」。

在民主多元的社會，特別是在網際網路所推進之數位與全球化的時代，「考試填鴨式」教育模式，終究會被時代淘汰，蓋其無法因應時代的快速變遷，培養所必須具備之創新與終身學習的能力。甚者，所謂「公共參與」能力，不要被窄化為僅有「民主公民教育」的意涵，甚至「教育整體」本身，不管是「知

識認知」或「價值」教育，皆有其「公共參與」的面向，亦即需要透過公共審議的方式，來開展學生的學習；教師提供「標準答案」的教學模式，應改變為教師引導學生共同找「合理答案」的學習模式；不管是針對知識認知或價值的問題，透過檢視不同的主張，實踐民主、多元、包容，卻也能形成公共的共同意見與意志；在學習社群中，共同解決問題與共同成長，建立「共好」的社會連結感。

從學生的班級公共生活，更是培養公共參與的最佳場域，惟不能僅讓學生討論班遊等一次性活動而已，更應將班級日常所必需面對的資源分配或秩序形成等公共性問題，進行公共的審議。甚至建立民主法治的規範治理模式，從小且從班級生活中，討論規則的明確性、公平性、可行性等，實際建立公平與有效的規範治理運作；教師不僅因此減輕班級經營的負擔，更讓學生培養出公共治理的責任感，與民主法治的基本素養。

教師在班級中帶領同學進行「公民行動方案」，可帶領同學走出校園或教室，直接面對社會上現實的公共政策問題，並提出改變的行動計劃，實際以行動來改變社會。這種社會參與的課程模式，把學生當成是社會的「公民」，把社區當成教室，引導學生走出教室，來關心現實的社會議題，並應用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蒐集資料，且在班級上進行公共審議，甚至要擬定可行的行動計劃，透過公開的展示成果，接受公眾的回應。「公民行動方案」透過「做中學」，培養學生的公共參與能力。

其實，培養學生的公共參與，有很多的方式與策略，但最重要的是，大人！請放手吧！然而，所謂「放手」，並非放任學生來承擔本來是大人的責任，而是透過公共的審議，來拓展學生的視野與能力；實質地立於平等的地位參與決定，可是重點在審議過程中，能一起來評估各種措施或答案的合理性，社群可以共同的成長。換言之，請尊重學生的參與主體性，把她們以「大人」為對待，她們才會成為「大人」！